

语言文学丛著

语言学之部
主编 杨春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翻译述要

马重奇

马重奇

古汉语翻译述要

语言学之部 主编 杨春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语言文学丛著

古汉语翻译述要

马 重 奇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福建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93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4—01093—6/H·43

定价: 3.50元

序

为了学习和继承我国古代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首先必须掌握古代汉语。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有种种。利用古今人的注解逐字逐句的阅读，大量背诵古代作品，多做练习，勤查工具书，这都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为有效的方法。古文今译，即把古代作品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是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一种常用的方法，因为通过翻译，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掌握古代汉语的特点，透彻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吸取古代各种文化知识。

但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毕竟由于时代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在读音、用词、语法构造以及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别，此外，在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方面也有许多相异之处。所以，要把古代汉语准确、生动地翻译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非常艰难的一项工作。

马重奇同志学习、总结了时贤的古文今译经验，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撰写成这部《古汉语翻译述要》。本书着重阐述介绍了古汉语翻译的有关准则、过程、方法、技巧及其注意事项，是目前第一部讨论古汉语翻译方面的较为系统的专著。全书共分八章。各章都注意把古代汉语知识应用于解决古籍中的翻译问题，力图揭示古代语言文字与现代语言文字的历史关系，从而探讨古汉语翻译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其中如阐述了古汉语翻译的准确性、规范性以及二者的辩证统一；从翻译的理解阶段、表达阶段、核对阶段来阐明古文今译的过程及

其方法；就古代词汇现象和句法现象比较古今汉语的异同；着重论述了古汉语翻译的技巧及其注意事项，等等，都是作者的研究心得。本书的体例编排系统简明，较有新意。我认为这本书对大中专学生学习古代汉语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对从事古汉语的译注、教学和研究的古汉语工作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也是有启发和参考作用的。

马重奇同志是福建师大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我与他相识是在1986年10月重庆西南师大和中国音韵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古汉语研究班上。他勤奋谦虚、基础扎实、兴趣广泛，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常给我寄送新出版的著作。如《杜甫古诗韵读》、《中学古汉语修辞》、《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趣谈》等，在音韵学方面他还写了不少有份量的论文。成绩斐然。《古汉语翻译述要》这部新著又将问世，我感到很高兴，廖承索序，也愿意写几句。

北京大学 唐作藩

1990年12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翻译说略.....	(6)
第三章 古汉语翻译的准则.....	(16)
第一节 翻译的准确性.....	(17)
第二节 翻译的规范性.....	(20)
第三节 准确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23)
第四章 古汉语翻译的过程及其方法.....	(30)
第一节 翻译的理解阶段.....	(30)
第二节 翻译的表达阶段.....	(40)
第三节 翻译的核对阶段.....	(51)
第五章 古今汉语的比较.....	(53)
第一节 古今词汇现象的比较.....	(53)
第二节 古今句法现象的比较.....	(69)
一、倒序句.....	(70)
二、几种特殊的古代汉语句式.....	(88)
第六章 古汉语翻译的技巧及其注意事项 (上) ...	(123)
第一节 根据上下文选择词义.....	(123)
第二节 词的转类译法.....	(128)
第三节 数词的特殊译法.....	(147)
第四节 代词的转换译法.....	(162)
第五节 语气词在翻译中的处理方法.....	(168)

第七章 古汉语翻译的技巧及其注意事项(下)·····	(177)
第一节 古汉语的增补译法(一)·····	(177)
第二节 古汉语的增补译法(二)·····	(186)
第三节 古汉语修辞的译法·····	(197)
第四节 古代地理风俗名物制度的译法·····	(206)
甲 关于古代的地理、职官、科举的译法·····	(206)
乙 关于古代的天文、历法、乐律的译法·····	(209)
丙 关于古代的姓名、礼俗、器物的译法·····	(214)
丁 关于古人思想意识方面的译法·····	(218)
第八章 韵文的翻译及其译例·····	(220)
后记·····	(249)

第一章 绪 论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文字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为社会服务的。早在文字产生之前，语言早已存在了几百万年，而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多得多。就拿我国的情况来说，我国共有民族语言70种以上，而有文字的语言不超过20种。而文字是标记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由于时代和区域的差异，同一种语言文字也会因“时有古今”而不同，也会因“地有南北”而产生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因此，如果不用一种语言文字把另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就失去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为社会服务的功能。

因而，翻译是沟通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了解古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诸领域的最好途径。翻译的种类繁多。就其时代性来说，有古代语言译成现代语言；就其内容来说，有文学作品的翻译（诸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有语言学论著的翻译，有科学材料的翻译（诸如医学、农学、天文历法等），有政论文的翻译；就其涉及到的语言来说，有本族语译成外族语，外族语译成本族语；就其处理方式来说，有全译、选译、编译等。为了配合古汉语的学习和教学，我们着重阐述和介绍古汉语翻译的有关准则、过程、

方法、技巧及其注意事项，试图对高等院校和中学古汉语今译的教学作一次比较系统的探讨和研究。

为了帮助现代人读懂古代留传下来的作品，最常用的辅助手段是对古代作品进行注释。注释指根据古代汉语的实际情况（如语音、词汇、文字、语法、修辞以及古代地理风俗典章制度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注释古书，使所作的注释符合原作的语言实际和作者的本意。注释的内容，包括注音、释义、释事和评论。注音有直音、反切、如字；释义是对词句篇章意义的解释，主要是释词；释事即对人名、地名、史实、词语的出处、典故的来源等进行考证或说明；评论指评论性注释。对古书的注释是帮助读者看懂古代作品的一种常见的方法。但是，由于注释显得比较零碎，同一种注释不能满足各种文化水平的人的需要。为了弥补古书注释本身的这种缺点，用现代汉语把古代作品准确而完整地翻译出来，不仅能使读者完全读懂古代的作品，而且能迅速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写作的技能技巧，从而更好地了解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的历史概况，以便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因此，翻译有其区别于注释的地方。当然，翻译也是注释中的一种方法，如《左传·晋楚城濮之战》：“微楚之惠，不及此。”注：“言晋文公如果没有楚国施予的恩惠，是没有今天的。”（见《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一五九页注⑭）自“言”以下的话，既是注释也是翻译。我们可以这样说，翻译都是注释，而注释则不一定是翻译。因为翻译只是用现代汉语把古典作品原文的思想内容、感情色彩和情调语气，按照信、达、雅的要求传达出来，着重点在于词句的古今对译。而注释所包括的注音、释事、校勘和评论等并不是翻译，

即使是对篇章意义的串讲也不是翻译，只是释义，诸如上述《左传》例才算是翻译。这即是翻译与注释异同的区别所在。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我国古代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首先必须学习和掌握古代汉语这一门语言科学。而加强古汉语的翻译工作，不仅能提高读者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而且对古代作品中的词汇、语法、修辞、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对文章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透彻了解也是不无益处的。因此，凡是从事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以及古代史、考古学史的学习和研究的同志，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都应该做好古汉语翻译这一项基本功的练习。当然，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毕竟由于时代的不同而存有较大的差异，比如在语音、词汇、语法、风俗习惯以及典章制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就是在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也是如此。这是古汉语今译的历史局限。所以，有些古典文学作品的译文就不如原作那样精练和流畅，这固然与译著者的水平高低有关，但历史的局限不可不认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前，“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是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所提出的。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于1982年3月1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制订了1982年到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据有关专家的估计，我国现存古籍约有8万种左右，建国以来，已整理出版和影印古籍2000余种。整理古籍，一方面要逐步满足专业人员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向社会广大读者和青年的普及工作。普及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古代文史哲名著进行今译，以便使尚

未掌握古代汉语的读者可以读懂，从而了解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此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专列了“今译”一项，根据精选原则，先对一批重要的、难懂的古籍全部进行今译。见于1982至1985年的今译部分有8种：

诗经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

尚书译注

战国策译注

史记译注

汉书译注

老子译注

庄子译注

见于1986至1990年的今译部分有12种：

屈原集译注

世说新语译注

国语译注

吴越春秋译注

后汉书译注

三国志译注

贞观政要译注

史通译注

孙子译注

荀子译注

吕氏春秋译注

淮南子译注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指出：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在研究的

基础上进行今译,并附以必要的注释。首先力求准确——“信”

“达”,然后求“雅”。至于选注、选译,也是普及工作中重要的方面,但将由研究、教学人员视当前需要并结合个人专长进行工作。总之,为重要的古籍作今译,已成为我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相当学术水平的古汉语翻译队伍,才能适应历史赋予我们的要求。究竟应该如何把古籍译成现代汉语,目前尚未有专书加以系统的介绍。作者试图对古汉语今译做一番探索,以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思 考 题

1. 谈谈翻译及其种类。
2. 翻译与古书注释有什么区别?
3. 为什么要进行古汉语今译的学习和研究?
4. 古汉语今译有什么局限性?
5.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6.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今译”一项里专列了哪几部古籍?

第二章 翻译说略

我国的翻译事业早在西汉哀帝时代就已开始，至今约有2000年的历史了。早期的翻译皆以佛经为主要对象。如西汉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口传一些简短的佛经经句，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安世高译了《安般守意经》，月支国人娄迦谶来中国译了10多部佛经等。这些翻译活动均属民间私人事业。到了苻秦时代，翻译事业有了较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当时的主持人叫释道安，翻译了《辘婆沙》。他因不懂梵文，主张直译法，以免失真。与此同时，道安还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他的译著有《金刚经》、《法华经》等300余卷。他主张意译法，批评以前群家的古直译风格，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帝之聘来中国译了《摄大乘论》等49部经论，在当时的佛教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可算是隋代和唐代了。隋代以翻译家释彦琬为代表，他不仅梵文造诣很深，而且还提出一套翻译理论。他对翻译者提出三点要求：（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带回了657部佛经。在他的主持下，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共1335

卷。他不仅将佛经由梵文翻译成汉文，而且还首创了《老子》译成梵文，将汉文著作介绍到国外。在翻译理论方面，玄奘还制定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唐僧实叉难陀、不空、义净等也译了许多佛经。到了唐末佛经翻译才渐趋衰弱。

在北宋时代，宋太祖、宋太宗虽然也重视佛经翻译，但其盛况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由于国家衰败，记载中不曾见到一部译经了。从元代至清代，佛经翻译呈现一派衰落的景况。但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翻译家。他们介绍了西欧各国的文学、哲学、科学等，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光启（1562—1633），明朝科学家、翻译家。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进士。他曾从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等，尽通其术。译著《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他是我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科学的先驱。

林纾（1852—1924），近代古文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举人。他喜《史记》，用力颇勤；崇尚韩柳，擅叙事抒情、婉媚动人。翻译西方文学，皆由人口译，再以古文义译。他曾与王寿昌合译法国大仲马《茶花女遗事》，自译莎士比亚等名人著作。英国翻译家 Arthur Waley 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书林》1982年第1期）。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160多部文学作品。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之处甚多。

严复（1853—1921），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原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主张学习西方，提倡新学，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等书，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严复的翻译方法，“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引鲁迅《二心集》），并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在我国翻译界有很大的影响。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意思是说，翻译工作有三项不容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著，译文通达流畅，文字典型。要做到忠实于原著本来就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文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信了就要注重达。严复在此强调了翻译首先要求忠实，其次要求通顺，使读者能够看懂。至于“雅”，严复又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意思是说，《易经》指出：做文章要讲究辞藻的优美和主题的正确。孔子也说过：做文章，不过是把意思表达得确切罢了。又说：语言、文字枯燥无味，就不能扩大影响。可见，文字的准确、流畅、优美，乃是做文章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搞翻译工作的标准。本来，除了文字的准确、流畅之外，还要求其典雅，这不仅仅是为了去影响尽可能多的读者就行了。严复在这里论述了“雅”和“信、达”的辩证关系。但是，他所谓的“雅”是

指什么呢？他把“雅”说成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不是指现时代人民大众所通用的文字语言，而是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在自己一生的翻译实践中就是遵循了“与其伤雅，毋宁失真”这一宗旨，因而译文不仅艰深古奥，又不忠实于原文。因此，严复对“雅”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由于时代的不同，严复对翻译标准“信、达、雅”的解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从这三个字的实际意义来说，还是正确的，因此许多年来，严复提出的这一翻译标准始终为我国翻译界所遵循。总之，严复对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马建忠的翻译理论。虽然马建忠以《马氏文通》一书闻名于中国近代的语法学界，然而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对翻译理论的阐述也不乏精辟之处。他曾指出：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其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追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之成文，适如其所译为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拟设翻译书院议》）

马建忠在这里阐述了翻译的全部科学过程。首先，译者要对两种语言深入研究，从“声音之高下”、“字句之繁简”、“文体之变态”以及“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诸方面找出其

异同；其次，要求译者要“经营反复”，彻底弄清原文“意旨之所在”，然后“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把它传达出来；最后，只有“心悟神解”，把它翻译成文，“适如其所译”，并且从效果上则要求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这就是马建忠深刻的翻译见解。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起点，也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揭开了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介绍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不仅内容上有了崭新的变化，而且形式上也较以前有很大不同，如译文的语言代替了文言，翻译质量不断提高，既忠实于原作思想内容，也比较地注意再现原作的风格了。如现代翻译家伍光建就是一例。他从事翻译数十年，译了近一亿字的各种作品，在我国翻译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在这一时期，对翻译理论的讨论也十分活跃，如翻译的必要性问题，可译不可译问题，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问题，如何提高翻译的质量问题等等。而关于翻译标准问题和直译与意译问题，是其中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

林语堂在这个时候写了《论翻译》一文，提出翻译的三个标准：“第一是忠实的标准，第二是通顺的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这三个标准实际上与严复的“译事三难”是相似的。他所谓标准，就如其下文所说的：“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至于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曲）的关系，当然不是‘雅’字所能包括。倘是照桐城吴进士‘与其伤洁，毋宁失